



以 羣著

苏联文学的光辉成就从哪里来？

上海文艺出版社

苏联文学的光輝成就从哪里来？

以 群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958 •

苏联文学的光辉成就从哪里来？

以 群 著

*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094号

华文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0125

开本 787×1092 案1/36 印張1 2/9 字数 22,000

1958年11月第1版

195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定价(7) 0.13元

目 次

小 引	1
一 党的领导給苏联文学带来了繁榮	5
文学事业是党的工作的組成部分	5
党給文学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6
党坚持文学的思想教育作用和文艺批評的 原則性	11
二 作家紧密地联系人民生活丰富了苏联文学	14
为什么战时生活在苏联文学中表現得特別 深刻?	16
亲身的生活經驗成了創作的无尽源泉	16
长期地在人民群众中生根落戶提供了生动的 艺术形象	19
广泛地联系人民群众丰富了作家的生活累积	20
紧密地联系人民生活保証了作家思想感情的 健康	23
三 严肃的思想斗争保証了苏联文学思想 的純洁性	25

苏联作家在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成长起来	25
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28
坚持文学作品正确地反映现实、提高思想性	32
反对文艺批评中唯美主义、形式主义和世界 主义倾向	36
小 结	39

小引

远在 1939—1940 年間，苏联卫国战争的前夕，国际形势非常紧张的时日里，苏联就曾经出現过一股资产阶级思想的文学逆流——“文学批评”派。这个宗派主义小集团是以当时侨居在苏联的匈牙利批评家卢卡契为首的。这个卢卡契，就是在 1956 年 10 月的匈牙利事件中担当了“裴多菲俱乐部”的主将的卢卡契。他在那时除发表了成套的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文学理论之外，还对苏联文学——特别是对苏联党在文学事业中的领导作用，进行了有“体系”的、全面的诬蔑和攻击。1937 年，卢卡契就曾经在“叙述与描写”一文里巧妙地歪曲苏联文学的面貌，诬蔑苏联文学“大多都属于左拉底文献式的小说底自然主义的意义上的唯客观素材的一类的。”“他们写给我们关于集体农場、工厂等等的‘专题論著’，人物大半只是作为‘附属物’，作为事物的連鎖中为了联系事物的說明材料而已。”他还捏造苏联小说的结构都“差不多”，苏联文学“教养底水准”“低落”，而把这一切“缺陷”——所謂“个性情节底稀少”的原因归結为“很少是由于作家們

底才能的缺乏，倒是由于……那些被虛偽的諸理論與諸傳統所俘虜了的作家們根本就沒有認識這種必要。”（見1940年12月出版的“七月”六集一、二期，呂熒譯文）到1939年，盧卡契更進一步，在“藝術家與批評家”、“論藝術家的兩種典型”等論文內很有體系地否定蘇聯文學的成就，誣指蘇聯藝術的“主要危機”是由於“官僚主義的樂觀主義”，蘇聯文學沒有“忠實地反映社會主義現實”，而“不過圖解了馬克思主義對於現實的理解”，他指責蘇聯作家“缺乏獨立思考”，而“只是圖解明白的、確定的觀念”，“對於政治的熱中”，“直接用政治觀點處理主題”。這種論調和他在1956年9月所發表的“近代文化中進步與反動的鬥爭”一文中所說的——蘇聯“以狹隘的庸俗的政治觀點來判斷文學作品及作家們”，“頑固地反對一切客觀性，按照經濟學的主觀主義的精神固執地、教條主義地來理解黨性的現象”，“助長了文學中的公式主義，助長了把遠景當作現實來寫照的風氣”等謬論，是一脈相承的，他的主要目的只是曲折地把矛頭指向黨對蘇聯文學事業的領導，反對黨對藝術創作的“政治干涉”，主張文學事業從黨的“監護”下“解放”出來，提倡作家“自治”和“創作自由”。

這種以反對蘇聯、反對共產黨為目標的“理論”，在十几年前就為反革命分子胡風集團所熱心販賣，並且作為他們反對黨對藝術事業的領導的理論根據和誣蔑中國的

革命文艺和苏联文艺的武器。令人惊讶的是反党分子馮雪峰在解放之后第七个年头（1956年11月），又繼承着胡风的衣鉢，重彈誣蔑苏联文学的老調，說什么“苏联文学的根本問題是教条主义。……根本在于脱离实际斗争，即脱离人类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偉大精神面貌。苏联文学与俄罗斯文学比較是缺少这种偉大精神的。……只是表面描写，真正的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精神沒有反映出来。”（見在文学期刊編輯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馮雪峰所說的苏联文学比較俄罗斯文学缺少的所謂“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精神”，不知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精神，但有一点却是明显的，那就是反对党对文艺事业的政治领导。而这一点恰恰是和胡风的“导师”卢卡契遙相呼应。

更令人惊讶的是青年右派分子刘紹棠竟也大言不惭地說什么后二十年（1937—57年）的苏联文学“只許反映社会主义优越性，服务于抽象的政治宣传目的，而不去忠实生活真实，不去正視人民内部矛盾”，“于是文学作品开始粉飾太平了，无冲突論风行了”，“文学事业比前二十年逊色得多了。”（見“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

这种說法，除了証明他对苏联文学历史的无知和对社会主义的頑强反对之外，是沒有任何意义的。事实上，苏联建国以来四十年間在文学方面的輝煌成就，已为全世界所公認，并且对全世界的革命文学事业发生了巨大推动力量。

为了比較具体地說明这些问题，我想从几个主要的方面来略述苏联文学的光輝成就的來由。

一 党的领导給苏联文学带来了繁荣

苏联的文学事业从一开始就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及时地給苏联文学事业指出了明确的方向，糾正了主要的錯誤，展开必要的思想斗争，而使苏联文学能够始終切合劳动人民的要求，在正确的道路上健康地发展起来。

文学事业是党的工作的組成部分

远在1905年，列宁就发表了那篇有名的“党的組織和党的文学”，提出了党的文学原則——“对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底一部分，成为一个統一的、偉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全体觉悟的先鋒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机器底齒輪和螺絲釘。”列宁所說的这个“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有組織的、有計劃的、統一的”党的工作底“組成部分”、受党“监督”、服从“党的监督”的原則，从一开始就成了苏联文学事业的总原則，并在这总原則之下，来保証个人的創造性，发展内容和形式的“真正自由”。在新經濟政策时期(1921—

1925年)中，一方面，資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謝拉皮翁兄弟”派、“构成派”，托洛斯基分子的“山路”派等对党所领导的文学事业进行了恶毒的破坏和进攻；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文学团体“在崗哨”派、“拉普”派等又犯了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錯誤。在这复杂而危急的情势下，党在1925年6月作出了“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的決議，提出了“一方面反对投降，另一方面反对摆共产党员架子”的口号，决定：一方面，以一切方法帮助无产阶级作家的成长，并用各种办法支持他們的組織；另一方面，反对任何集团对苏联文学事业的“独占”、“专横”和“行政干涉”，而提倡以文学批評来开展思想斗争，主張“各种集团和派別自由竞赛”。在党的这个指示的推动之下，不仅改进了作家間的团结关系，而且促进了文学創作的繁荣，产生了几部苏联文学的經典性著作——如法捷耶夫的“毁灭”、阿·托尔斯泰的“一九一八年”(“苦难的历程”第二部)、馬雅可夫斯基的长詩“好！”、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第一、二部等。

党給文学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1932年4月，在第一个五年計劃接近完成的年月，党更繼承着1925年的決議的精神，按照新的历史条件，作出了“改組文学团体”的決議，一方面决定取消无产阶级文艺团体，另一方面，推动“把一切拥护苏維埃政权納

領和力求參加社会主义建設的作家團結成……單一的蘇聯作家協會”。這個決議成了蘇聯文學歷史的重大轉折點，它促成了第一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的召開和蘇聯作家協會的成立（1934年9月），並且推動了蘇聯文學界總結了過去二十年的經驗，提出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在蘇聯文學界的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的鼓舞之下，陸續產生了高爾基的“克里·薩木金底一生”、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第三、四部和“被開墾的處女地”第一卷、阿·托爾斯泰的“彼得大帝”、尼·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馬卡連科的“教育詩”、卡達耶夫的“霧海孤帆”等光輝的巨作。而尼·奧斯特洛夫斯基、馬卡連科、克雷莫夫、戈爾巴托夫、西蒙諾夫及詩人特瓦爾采夫斯基等，都是在這年代中誕生的新作家。

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都足以說明：蘇聯的黨堅強而正確地領導了蘇聯文學工作者對種種資產階級思想進行鬥爭，也堅決地進行了對簡單化的教條主義和狹隘的宗派主义思想的鬥爭。正是這些鬥爭促進了蘇聯文學的繁榮，引導蘇聯文學在正確的軌道上大步前進；而決不是象某些右派分子所說的那樣——黨的領導促成了教條主義和宗派主义的发展。這些歷史事實是任何人都無法篡改的。

特別值得我們細心分析的，是在蘇聯衛國戰爭之後的年代中，黨給蘇聯文艺事業指出了怎樣的方向。在戰

后的 1946—48 年之間，苏联党作出了有名“列寧格勒”两杂志的決議，关于剧场上演办法的決議，关于影片“灿烂的生活”的決議；1954 年发布了給第代表大会的“祝詞”；1956 年第二十次苏联“总结报告”中指出了苏联文学艺术工作久以前发表的赫魯曉夫关于文学艺术的談到文学艺术的問題。在这些极重要的党的联文艺工作者指出了如下的方向：

反对对现代欧美资产阶级文化艺术的是 1946—48 年之間有关文艺的決議的重些決議严正地指出了战后在苏联文学、戏剧追求资产阶级的唯美主义、颓廢主义、形而上义等不健康的傾向，这些傾向明显地表露资产阶级堕落艺术的盲目崇拜，宣傳不問而艺术”，排斥思想性，对古典艺术的优良传统是对俄罗斯民族艺术的优良傳統，采取虚的态度。党的決議指出：苏联艺术必須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防止异己思想侵蝕；而提倡尊重世界古典艺术的优良傳統真地繼承十九世紀俄国革命的民主主艺术傳統；肯定和支持苏联绝大多数艺术政治問題，为人民的需要服务的优秀傳統精

联人民的需要和艺术趣味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倾向，明确地指出这种个人主义倾向是传统背道而驰的，是根本反人民的。1954年委员会致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苏联文学“应该坚决地……同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其他表现的复活进行斗争！把文学推入市侩主义、思想空虚和颓废的圈进行斗争。”在1957年苏共中央召集的赫鲁晓夫又坚决地指出：“在现代世界上，本系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正在进行激烈的斗争中，中间立场是不可能的。文学艺术们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而跟同我们格格不入化影响，跟过时的概念和观点进行斗争。”苏共中央这一系列的决定和意见，都表明党始终认为当资本主义世界还继续存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领域内，必须不断地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保持高度的警惕，对它们采取不调和的斗争。及时的指示是保证苏联文艺思想的纯洁性。

3年的决议中苏共中央反复指出的另一点是苏联文艺家必须熟悉人民的生活和需要，必须有深刻的社会联系，重视对人民的艺术创作。号召文艺家重视表现当代的根本问题，描

繪苏联人民的优良品质，重視文艺作品的真实性和现实性，反对文艺脱离政治，脱离人民的生活。苏共中央致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祝詞”里又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艺术家……要透彻地了解人民的真正生活，了解他們的思想和感情，对他们的感受息息相关。”尤其值得重視的是苏共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里，赫魯曉夫特別提出：“我們的文学和艺术在許多方面仍然落后于生活，落后于苏維埃现实，而这种生活和现实比我国文艺所反映的不知要丰富多少倍。我們有理由要問：我們的某些作家和艺术工作者是不是同实际生活联系得太差了？”党的这种指責不是由于对苏联文艺成就的低估，而是由于对苏联文艺更进一步的繁荣和丰富的关怀。今年赫魯曉夫的談話中又再度着重地提出这問題。这都可以看出苏联的党是把苏联文艺家与人民群众的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看作苏联文艺的路線問題，看作提高苏联文艺质量、丰富苏联文艺創作的根本問題。事实上，苏联文学的許多表現当代生活和斗争的优秀作品，沒有不是从作者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中产生的。

某些資产阶级右派分子（包括世界各国的）常常誣蔑苏联的党和政府是鼓励作家“粉飾太平”的。而事实上，反对粉飾现实，恰恰是苏联党对文艺創作的指导原則之一。苏共中央致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祝詞”就明确地指出：“粉飾现实”的倾向——“对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

生长过程中的困难默不作声的倾向”，“对我們文学的发展起了不良的影响”。“对人們意識中資本主义殘余的斗争，沒有在文学中得到应有的反映”。赫魯曉夫在苏共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里也特別提出这一点：“党曾經进行斗争而且还要进行斗争来反对对苏維埃现实的不真实的描写，反对粉飾现实的企图。”只是苏联的党是与反对粉飾现实同时，“也反对嘲笑和誣蔑我国人民的成就的企图”。(同上“总结报告”)赫魯曉夫在不久以前的談話中說得非常清楚：“整个問題在于站在什么立場上和抱着什么目的来进行批评。我們揭露和批评缺点和錯誤，是为了消除我們道路上的这些障碍，……保証新的胜利和更迅速地前进。”蕭洛霍夫、奧維奇金、尼古拉耶娃等都是勇于揭露苏維埃生活中的缺点的优秀作家，党支持他們的反映真实的优秀作品，但是，他們却与誹謗苏联人民、誣蔑苏联现实、嘲笑社会主义的偉大成就的表现資产阶级思想的文艺，站在完全对立的地位。

党坚持文学的思想教育作用和文艺批评的原则性

苏联的党一向强调文艺发挥思想教育的作用，坚持“苏联文学的任务是在于帮助国家正确地教育青年”，“教育新一代成为生气勃勃、相信自己的事业、不怕障碍、决心克服任何障碍的人”(1946年的決議)，坚持“我們的作家負着使命要以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苏

联人”，“我們的文学負着使命，不仅要反映新事物，而且要尽力帮助新事物取得胜利”（1954年的“祝詞”），坚持“文学和艺术創作必須貫串着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精神，必須向人民灌輸蓬勃的情緒和坚强的信念”（1956年二十次党代大会“总结报告”）。苏共中央对文艺的始終一贯的要求——加强思想教育作用，促使苏联文艺提高了思想性，丰富了思想內容，正是这种精神使苏联文学站在当代世界文学的最高峰。这事实是不容資产阶级右派分子誣蔑、歪曲的！

苏联的党在1946—48年有关文艺的決議中，还坚决地反对文艺批評中把“私人利益”和“朋友交情”作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态度和庸俗倾向，提倡以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为基础的布尔什維克的原則性的精神。赫魯曉夫在最近的談話中，尖銳地反击了那种高唱“創造性受到束縛”、要求“創作自由”的論調，这些人希望对那些歪曲苏联社會生活的“作品”，“不要提出原則性的估价”，“也不要进行批評”，而这是党决不能迁就，不能妥协的，因为这違背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精神。苏联的党一向号召作家們“进行大胆的創作努力，丰富和进一步发展文学的各种形式和体裁”（1954年的“祝詞”），但是党却坚决反对文艺界以私人利益、小集团利益为基础来进行互相阿諛、奉承，对錯誤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取消原則性的批評。苏联的党始終主張：文艺批評必須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